



何以生情

回虞晖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有南北两个校区，我所在的理论研修班被安排在南校区。原本并不很喜欢南校区。觉得它小，还没水，不像是心中理想校园的样子。2021年3月1日开始，一个学期的生活和学习，绝大部分是在南校区度过的，偶尔会有大报告或者其他教学活动等需要去北校区，但多数时间还是在南校区的校园里。

于是，四个半月，我便几乎天天在这又小又没水的校园里转。身边各样的植物生命体重复着一年一度的生长。从嫩芽到盛放，再到成熟，那些花儿、草儿、叶儿、果儿的成长在日复一日的路过中被惊讶、喜爱、感慨，以及记忆。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天天都能转很多圈的校园可爱了起来。四个半月结束时，我很自然地不想离开。

这，是不是像极了日久生情？

在党校的那段日子，我确定这便是日久生情。以致四个半月后，还常常有美好的记忆袭来，关于日日踏足的南校区，以及间或造访的北校区。

我依然时常想起孔子像。中央党校的主题雕像很多，也很著名，比如北校区的毛泽东雕像《我们的老校长》，比如南校区的马克思恩格斯雕像《导师》，许多雕像在深厚的情感和深刻的启迪之外，并不会让人忽略它们本身的艺术价值，透过凝固传神的三维块面语言，它们生动厚重了整个校园。孔子雕像就叫《教育家孔子》。



《教育家孔子》雕像

子》，位于南校区靠近南门处的樱花园中。孔子就站立在方形的基座上，低眉慈目，身形微躬，两掌叠放，拱手行礼。不用去看雕塑的名字，你一眼就能知道他是孔子，宽袖古服，眼眉身形，姿态神韵，无一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孔子。雕像四周，是层层叠叠的绿色，星星点点的花意。雕像的水墨丹青，广场的天圆地方，周边的曲径通幽，无论从哪个角度，无论在哪个时刻，都是满满的中国味道。

在党校，随处都是这种很中国的时空。设计是很中国的，中轴线理念被戴念慈明明白白地刻在了北校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建筑是很中国的，特别是大礼堂，北校区大礼堂通往掠燕湖的石制长廊，南校区正对着港澳中心广场的金属制长廊，都被早春的绿意覆盖，偶有紫藤透出，欢快的小花如风铃一般从长廊顶部垂落，借着晚间的灯光让人惊鸿一瞥，即使没有大树，即使只是晚间，也必能让人记起“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北校区的掠燕湖是这种中国式自然生趣的核心，时不时便会碰到一群黑天鹅，或者两只白天鹅，“眼沙卧水自成群”。当然，在校园里久了，无论是北校区还是南校区，总会有那么几次，可以遇见“树深松鼠竞”，或是“闲闻啄木鸟”。

浓郁的中国味道在北校区掠燕湖北部尽头的一处山石清泉旁达到了顶峰。林木葱茏、柳浪轻拂之中，《问道》徐徐展开。这是另一尊与孔子有关的雕像。孔子拱手致礼，谦逊沉

稳，既在聆听，更在沉思；老子食指向上，笃定安详，似在发问，又像布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座高山在这里，是问道，是回答，更是交流，是互促，中华文明开放偕时、包容互鉴的本质和精髓尽显无遗。他们身旁，千翠山上的清泉日日流淌，润物不息。

我依然时常想起《情系贺兰》。这是一部情节很简单的话剧作品，取材于从西海固到闽宁镇搬迁、福建援建宁夏时的真实事件。开头一场神圣的祈雨仪式，为了长久得不到滋润的土地；结尾是同样神圣的祈福仪式，为了失去生命的扶贫干部闽兰——呼应得不露痕迹又感人至深。干净的舞台，干净的语言，包裹在戏剧的张力之外，传递着对于摆脱贫困这一时代课题的深邃思考。在党校，这样的话剧、戏剧、电影、演出，像大报告、讲座、案例教学、常规课堂一样被列入课程之中，对于时代问题、前沿问题的深切关照、客观审视与哲理思索，就在这些并不密集却足够有力的形式中缓缓呈现。

我们班的固定教室在南校区应急楼105，这是一个论坛式阶梯教室，学员的座位围成扇面的半圆形，老师的讲坛在圆心。许是这种座位方式也激发了大家勇于探索讨论的本心，课堂上课下，总有无数思想的碰撞。每个单元或几个单元的教学结束，会安排一次该单元任课教师和学员的双向交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教师们从不敷衍的回答，始终谦虚地分享自己对于这些课题永不停歇的追问。在我想来，时刻保持着对于现实问题、时代课题的敏锐与探究，是这里的课堂最激动人心的品质。

我依然时常想起鹅掌楸。我们班的学制安排在春季学期，入学没多久，校园里原本干枯的各种枝条便开始次第展露自己盎然的样子，每天都像在上植物学的课程。鹅掌楸是一棵大树，真正的高大，藏在南校区花园的中部，枝繁叶茂，耸入云霄。那一天，突然发现它开花了，花朵便是鹅

掌一般，明亮的黄色，温润的形状，轻而易举再次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南校区虽不大，植物的种类却不少，但鹅掌楸好像也只有这一棵，在我看来，它算得上是“镇园之树”。

鹅掌楸开花的那几日，在北校区有个晚间的教学活动，到得早了些，便如往常一般在校园里随意走走。北校区来得不多，当天选择的也不是平日常走的路线，再加上是晚间，走着走着便不知误入哪条小巷深处了。凭着记忆辨认方向之时，突然抬头，竟发现了鹅掌楸那明亮的花朵！原来这里也有一棵鹅掌楸。再仔细看去，这棵鹅掌楸树下，是一尊半身胸像，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身着中山装，目光敏锐，神情睿智。

中央党校北校区有两座县委书记的雕像，焦裕禄和谷文昌在中轴线东西两侧遥遥相视。焦裕禄当年带领干部群众除内涝、抗风沙、战盐碱，把一切献给了兰考人民；谷文昌在东山县与群众一起挽起袖子种树、卷起裤脚型田、汗如雨下抗沙，奋战14年把荒岛变为宝岛。难以割舍的百姓情怀铸就了两位县委书记同样的精神坚守，两座雕像的矗立正是来自百姓的长久感念。

我一直记得鹅掌楸花在谷文昌雕像旁盛放守护的情景。谷文昌的雕像旁是鹅掌楸，这应该是偶然，但这种安排却又如此自然，如此顺理成章，如此令人深省。

平凡而伟大，平凡才伟大。

结业已经一年多多了，孔子，《情系贺兰》，鹅掌楸，还总是那么清晰，仿佛依然在身边。所以，何以生情？

多半不单单是日久，而是源自于这个学校本身便有的遮不住的的气质吧。它用九十年的执着涵养着这份气质，那烙刻在生命基因里的中国气息，那生长在眼中心头的时代追寻，那弥漫在无限时空中的人民情怀，凝聚成了足以令人生情的渊数。而我，感之弥坚，悟之弥深，无论身处其中，还是离开已久。

（作者系民族团结杂志社纪委书记）

庆祝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

党校情缘——学员眼中的中央党校

（上接3版一条）

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中，郭大力对马克思、恩格斯充满崇敬。正是由于这种崇敬，他先后三次倾力编译《恩格斯传》。这部书的作者是柏林大学教授古斯塔夫·迈耶尔。郭大力对这部书爱不释手，1939年拿到原著后很快翻译出来，但译稿在邮送出版社途中丢失了。1940年重译一遍后译稿交

朋友代存，也遗失了。1947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是第三次译稿。他说：我不惜再三重新动笔，是因为这位思想家的生活，太使人敬爱了。他的勇敢，他的热情，他的谦虚，实在使人神往。

对于事业上所取得的成绩，他从不居功自傲。他认为自己能取得成绩，应该归功于党。他生前常

说：我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由于党的事业的鼓舞；我能坚持几十年，也是由于党的领导和支持。没有党的关怀和支持，就没有我的一切。很多学者赞叹他为翻译《资本论》三卷作出的贡献，但郭大力从来都认为，“这决不是表示我应享有较优的权利，因为没有亚南的合作，这部书的完成，决不能这样迅速，甚至在我们应再开始的时候，

也许根本就不会再开始”。

郭大力先生四十八载译介人生，数十册经典译著，倾注了他对践行革命理想的全部心血。他对《资本论》的钻研和教学贯穿一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极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对中央党校及党校系统的理论教学工作起到无可替代的榜样作用。

程。出版《危机沟通》《危机决策》等硕士研究生教材。2019—2022年，累计招收博士15名，学术型硕士2名，指导MPA学生60名。

2019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大力培养应急管理人才，加强应急管理学科建设。新时代新征程，应急管理学科迎来了重要发展机遇，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欧应急管理研究院）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找准学科学术发展定位，厘清学科学术发展思路，落实学科学术发展举措，全面推动应急管理学科学术发展，努力打造党和国家培养领导干部应急管理能力的基地和应急管理高端智库，为党和国家应急管理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千百年来，中国妇女一直被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所束缚，直到一百多年前，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妇女的社会地位开始有所提高。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踏上了争取解放之路，无论在婚姻自由、人格尊严、教育平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一点在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妇女解放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民国时期法律对女性权益的保障是局部的、不完整的。比如，忽视性别平等的权利。1912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推出了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法律虽然明确提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但对“性别”一项不置一词。再比如，维护夫权的趋向十分明显。《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以下简称“《亲属编》”）虽然从法律上对“一夫一妻”制给予了肯定，但具体法条的解释却与此相悖。此外，从《亲属编》的规定来看，与丈夫相比，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十分低下。作为妻子，没有姓名权，“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没有财产权，妇女结婚后，应将其原有的财产交丈夫统一管理，丈夫对此有使用、收益和事实上的处分权；缺少教育子女权，对于未成年子女，“父母对于权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时，由父行使之”。

与国民党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徘徊犹豫行动迟缓不同，彻底反对封建社会强加于女性的压迫与束缚，始终倡导并坚持男女平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都对世界妇女运动的意义有深刻洞察，并积极宣传妇女解放。在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的过程中，聚集了一批关注妇女解放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鲁迅、李达、恽代英、向警予等。他们把几千年传统社会积淀的妇女问题与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必须伴随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社会解放而得到实现，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便将领导妇女运动列入了它的议程之中。

1921年12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创办了《妇女声》半月刊，大量报道国内外妇女运动的情况和国内各地女工的罢工斗争，着重讨论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在中国妇女运动历史上，这也是第一个以政党的名义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向警予主持制定的《妇女运动决议案》。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向警予主持制定的《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这些关于妇女运动的一系列决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高度重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已经有意识地用法律的形式维护妇女权益，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区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在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理论指导下对婚姻家庭制度做了最初探索，如1930年闽西根据地的《保护妇女青年条例》《闽西婚姻法》，1931年鄂豫皖根据地的《婚姻问题决议案》等。1931年，毛泽东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其中明确提出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原则，并指出：在封建统治之下，男女婚姻野蛮到无人性，女子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比男子更甚。只有工农革命胜利，男女从经济上得到第一步解放，男女婚姻关系才随着变更而得到自由。目前在苏区，男女婚姻已取得自由的基础，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 焦利

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但是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能完全独立，所以现时离婚，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引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担负。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作为适用于当时全国一切革命根据地的统一的婚姻立法。该法规定了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任何形式的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婚姻关系中，男女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等条款。该法不仅是对过去旧式封建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否定，而且为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婚姻立法及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提供了法律蓝本。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壮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将妇女解放和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不断推向前进，《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等相继出台。在解放区，农村展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土地政策上一直延续1928年在井冈山时期制定的《土地法》，规定土地“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的原则。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规定，离婚后男女各得田地；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则更加明确地规定了离婚女子可参与新居乡村土地的分配或保留原有土地。这意味着在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农村妇女获得了与男性一样的经济权利，有了独立自由的经济基础。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国家实行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妇女的解放和发展而奋斗，是由自身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决定的。而正是由于高举“妇女解放”的大旗，对广大妇女的权益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实行全方位的保护，中国共产党也赢得了广大妇女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她们义无反顾地听党话跟党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独特而卓越的贡献。

红色记忆